

日本最长的一天

〔日〕太平洋战争研究会
韩有毅 夏宁生 何勇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世琦

封面设计：王保进

日本最长的一天

〔日〕太平洋战争研究会

韩有毅 夏宁生 何勇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6.5印张 161,000字 印数：1—3,4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3086·160 定价：0.96元

译者序

一九八五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为了纪念中国人民的这一伟大胜利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我们特将《日本最长的一天》译出，奉献给广大读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九三九年全面爆发到一九四五年德、日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历时六载，战火蔓延欧、亚、非三大洲，先后有六十多个国家、两亿多人口卷入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它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国际帝国主义，有力地促进了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旧世界的面貌，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一九四五年，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在望。五月八日，纳粹德国正式投降，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七月，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了波茨坦会议，发表了著名的《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这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反攻。八月八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八月六日与九日，美国先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此时的日本已成瓮中之鳖。面临这一局势，日本朝野一片混乱。内閣中，以外务大臣东乡和海军大臣米内为首的“主和派”迫于形势，力主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而以陆军大臣阿南为首的“主战派”则妄图负隅顽抗，叫嚣“进行本土决战”。八月十四日，日本到了最后关头。在两派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日本天皇裕仁做出“圣断”，决定无条件投降。这时，一批好战的少壮派军官发动了一场企图控

制皇宮、奪取兵權的未遂政變。

日本太平洋戰爭研究会探微索隱，在《日本最長的一天》一書中，詳盡地再現了從決定投降的最後一次御前會議到宣布《終戰詔書》的二十四小時內發生的一幕幕事件。的確，這是日本歷史上最漫長的一天。

《日本最長的一天》問世以來，曾先後被譯成多種文字。本書出場人物眾多，敘述的事件錯綜複雜，可謂日本帝國崩潰前的一幅真實寫照，也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和日本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內幕史料。至於書中鑒于作者的立場而流露出的對一些日本戰犯不無同情的描寫，乃至對一些歷史事件失當評價，相信讀者自會分析、鑒別。

韓有毅 夏守生 何勇

一九八五年九月

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正午十二时，日本同时发生了两个历史事件：日本天皇发表广播讲话，晓谕自己的臣民，他们的国家打了败仗；日本人民听到了天皇的声音，这对大多数国民来说还是破天荒第一次。本书详尽记载了这次广播之前的二十四小时内——从决定投降的御前会议到宣布投降——所发生的种种事件。这是日本人民经历过的最漫长的一天。

对我们太平洋战争研究会年轻的同仁们来说，编写这部史料的想法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我们此生似乎无缘再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再次经历如此严峻的时刻。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标志着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百年史上的高潮，日本人民和日本国的整个未来完全取决于这一天。

我是太平洋战争研究会里最年长的成员，但在天皇宣告投降的那一天，我还只是个中学三年级的学生。尽管如此，我却一直在为战争出力。我被选派到一家生产二十毫米口径机关枪子弹的兵工厂工作，后来这家工厂被B-29轰炸机夷为平地，跟我一起做工的许多同学被炸死。前线甚至已经伸展到了我们脚下，但我依然盼望着日本赢得胜利。所以，在八月中旬的那天中午，我的心里交织着一种悲哀与愤懑的感情，夹杂着一一种绝望的徒劳感。因为我们听说，随着日本被占领，我们将不得不沦为亡国奴。

那天，我平生第一次抽了烟。这是校方绝对禁止的事，但我决计承担一切后果。尽管我还很年轻，但我似乎觉得，剩下的时间好象已经差不多了——我做任何事情，总是兴味索然。我们当中那些战争幸存者，无论在国内抑或在前方，多少都尝到过战争恐怖的滋味。人与人之间残酷无情这种常见景象，必然使我们变

得冷酷起来。虽然八月十五日结束了某些这种惨无人道的现象，但对日本人民来说，战败无疑是一场浩劫，其影响之大甚至今天都很难估量出来。日本现在仍未找到抚慰战死者亡灵之道——在她真的见到这种途径之前，就很难说日本究竟是忘却了过去，还是一味沉溺于现在。是什么导致成千上万人丧生？从这长达二十四小时的戏剧性事件中的主人公们所思所行，人们便可以找出某些答案。这是我们写作本书的动机之一。

在日本，为国捐躯几乎一直被视作一种宗教义务。对一个民族来说，要抛弃一种古老的、根深蒂固的信仰，二十年时光也许并不算长。但是，倘若日本人民想要生活在今天的而不是昨天的世界里，他们就必须抛弃这种信仰。这也许是我们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

在某些当事者依然健在的情况下修撰当代史，困难之多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也会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史书来。我们访问了当年日本战败时最后一幕中的每一个依然在世的当事人——唯一的例外是这出戏剧的主角，日本天皇本人——自然，我们披阅了所有发表过的资料，但我们的报道依据的却主要是那些访问记。我们再现了当年的各种行动、感情和心境，所有这一切都由我们访问的那些人赋予了血和肉。

当时，这一事件中的许多主人公都已是耄耋老者，有的现在已经去世多年。有些人就死于当天，还有的人至今不愿开口。在我们采访当年的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的时候，他始终一言不发。

日本争取投降的斗争是一场地震，至今人们仍可感觉到它的余震。详细追述战败的悲剧性情节，必然会勾起种种令人不快的记忆，但同时也有助于为日本的新生铺平道路。或许这就是我们撰写本书的最主要的缘由。

太平洋战争研究会
半藤一利

前 夕

一九三一年，日本皇家军队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从而变成了日本社会生活中的主宰力量。十四年之后的一九四五年，日本天皇及其大多数政治家们意识到，日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但他们面临的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却是如何结束这场战争。皇军依然杀气腾腾，他们既不愿承认战败，也不愿投降——他们坚信，军队，只有军队，才知道日本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日本最后这场斗争并不是与敌人的厮杀，而是日本内部的较量：在这八月漫长的一天里，这场斗争一度看起来将要出现毁灭性的结局。如果说这场斗争是围绕着天皇展开的，那么最终解决争斗的也正是天皇自己。

早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就已经认识到，美国对日本的优势必将最终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他私下里建议天皇“抓住一切时机尽早终止战争”。随着战争的进展，其他人也得出了同样危险的结论——只所以说“危险”，乃是因为军部并不赞成这种结论。

通过美国战略情报局驻瑞士的一个机构暗地里进行的结束战争的努力毫无结果；不少人，包括天皇本人在内，宁愿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的“斡旋”——直至苏联对日宣战的那天为止。铃木贯太郎的现任内阁跟东条英机将军的内阁大不相同。东条英机是“与德国平分世界”这一军部计划的主要制定者之一，铃木的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则是主张接受波茨坦公告一派的首领。尽管事到如今已经为时太晚，难以解脱日本人民多少苦难，但接受波茨坦公

告是使日本人民免遭灭绝的唯一途径。

两大派——主和派与主战派——都决心维护国家的根本体制，甘愿以身殉道、以死报君，在这方面两者是一样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对于两派来说，同样不可思议。在这一点上——似乎只有在这点上——他们的看法才毫无二致。

二十天之前，日本人民从睡梦中醒来，又迎来一个战时普通的夏日清晨：天气闷热，腹中空空，很可能一直会这样；可是人们还有工作要干，那就是进行战争。由于营养越来越差，空袭越来越紧（这意味着一些人的死亡，更多人流离失所）、原料匮乏影响了急需品的生产，进行战争日益困难。所有这一切都处在日本夏季的闷热之中。饥饿、疲倦但依然无所畏惧的日本人民暗想：又是一天；昨天如此，明天亦复如此。

然而，他们想错了。日本政府心里明白，因为那天早晨六时，东京的海外广播局收到了美国旧金山发出的一条消息，它公布了前一天由美国总统、中国委员长和英国首相联合签署的一项公告。三国首脑在波茨坦进行了磋商，最后决定“应该给日本一个机会来结束这场战争”。外务省一边着手研究公告的条款，一边把公告译成日文：

日本是继续处在那些刚愎自用的军国主义的谋士们——他们那些愚蠢的想法已经把日本帝国带到了毁灭的边缘——的控制之下呢，还是愿意踏上明智之途，由日本作出抉择的时候已经到了。

下述是我们的条件。这些条件不容更改，没有选择的余地，也不容拖延。

必须永远清除那些蒙蔽日本人民、使其误入征服世界歧途的人的权力和影响。因为我们确信，只有把不负责任的军

国主义从地球上消灭掉，才有可能建立一种和平、安全与正义的新秩序。……

我们无意使日本民族遭受奴役，也无意灭亡他们的国家，但所有战犯应当受到严惩，包括那些残酷虐待我方战俘的人。日本政府应当扫除一切障碍，复兴和加强日本人民中的民主倾向，实行言论、宗教信仰和思想自由，尊重最基本的人权。……

我们呼吁日本政府，马上宣布所有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并且完全、充分保证他们如实贯彻执行。否则，日本将迅速地、彻底地被摧毁。

日本政府中最先对旧金山广播做出积极反应的是外务次官松本春一。他向东乡建议，日本必须接受公告所列条款，拒绝这些条件将是最愚蠢不过的事。事实上，当东乡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松本已经动手起草一份日本接受该公告的声明。这份声明将发给日本驻瑞士和瑞典的公使，再从那里转送同盟国。

“且慢，”东乡外相阻止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他的声音听起来充满无限悲哀，仿佛他的话正从寂寥空旷的高空传来，他觉得肯定不会被人听见。“军部永远不会接受现在的公告。”

不过，东乡感到，同盟国把开罗声明中首先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降格到“所有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这一事实表明，有可能出现较为有利的条款或者同一条款出现较为有利的说法。而这些条款与说法则既能为军部所接受，又不失体面。因此，东乡断定，在作出答复之前，日本应当做出最后一次努力来利用苏联的“斡旋”。

尽管东京与莫斯科之间进行的所有谈判至今毫无结果，东乡还是作出了这一结论。谋求苏联驻日大使协助的种种努力已告失败；对日本皇室希望派遣近卫麿亲王作为特使前往莫斯科的要

求，克里姆林宫拒绝给予明确的答复；日本驻苏公使佐藤尚武明明白白地告诉东乡，“争取苏联的工作已毫无希望……”。在雅尔塔，罗斯福与邱吉尔已经秘密同意在远东做出重大让步，只要斯大林在欧洲战事结束后的两三个月之内对日作战。这当然是东乡所不知道的。

不管东乡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他不仅使自己，而且使首相相信，苏联对日本并无恶意，克里姆林宫依然可以从中“斡旋”。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三十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开会，讨论波茨坦公告以及苏联调停的可能性。这个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或称“核心内阁”，由日本的“六巨头”组成：总理大臣、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会上，东乡强调了从“日本无条件投降”到“所有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这一措辞变化的重要性。东乡宣称，他认为拒绝波茨坦公告将是“极大的失策”。尽管反对意见很大，东乡还是说服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先听听莫斯科方面的动静，然后再给以答复。于是，任凭公告中有“不容拖延”这样的不祥之词，这段时间还是成了“观望”时期。

怎样用最恰当的方法把波茨坦公告告诉日本人民，成了又一重大问题。为此，当天下午召开了内阁全体会议。

东乡茂德再次打了头炮。东乡六十二岁，为人傲慢，向来视他人的意见如粪土，讲起话来比铃木首相直率得多。当时，铃木首相年逾七十七岁，老朽昏聩，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在那些好象永无尽头、永无结果的会议上，他甘愿让别人出风头，自己在那里打瞌睡。

东乡宣称，鉴于波茨坦公告是和谈的唯一基础，所以他认为，在政府能够采取这种或那种坚定立场之前，不应把这个公告公诸于众。

厚生相园田忠彦表示反对。他说，既然波茨坦公告已经在全世界广播，那末，日本人民不可能听不到；在此之前，日本人民应从自己的政府那里正式获悉这个消息。情报局总裁下村完同意园田的说法，他又补充说，推迟宣布波茨坦公告的做法，有可能被外国视为日本政府过分担心目前局势。

现在，大家的目光一起转向了陆相阿南惟几大将。他是军部代言人，所以仍旧是日本最强有力的人物，虽然他缺少他的某些前任们所具有的那种风采和热情。阿南五十七岁，由于从事射箭和击剑运动，他显得年轻漂亮。在少壮派军官的眼里，阿南是一位可依赖的、近乎父辈般的人物：他们相信，在继续日本已经进行的这场战争中，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在内阁会议上，阿南坚持不懈地、始终如一地培育着他们的这一信仰。

现在，阿南坚持认为，倘若把有关波茨坦公告的消息公诸于众，政府就必须同时表明它反对公告条款的理由以及它希望日本国民采取的态度。阿南的见解得到了陆海两军参谋总长的赞同。

会议最后达成了一个折衷方案。既然政府既不能对这一公告完全置之不理，又不能在决定自己的立场之前把它公布出来，内阁决定含糊其辞地发表这条消息——就好象波茨坦公告不是在波茨坦而是在一个虚无飘渺的世界里颁布似的。政府将不表明自己的立场；大小报纸要尽量避免渲染这一事件，报纸可以发表经过删节的公告文本¹，但不得发表任何评论。

此时此刻，日本政府的打算是，“不理睬”波茨坦公告。尽管阿南一再坚持要发表某种措辞强硬的抗议，铃木还是同意了东乡的意见。他说，用一个词，一个眼下人所共知而又可悲的词来说，政府将“默殍”这个公告。也就是说，政府将以沉默使之化为乌有。“默”者乃为“沉默”，“殍”者“杀死”之意；合二而一，《新和英大词典》中的释义是“不予理睬，不屑一顾，不注

意”。“默霖”还有另外一种含义：“保持在一种聪明的、不声不响的状态中”，显然，铃木取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不幸的是，前一种释义显得更加触目，更有说服力。第二天一早，当“默霖”一词在东京各家报纸的头版上出现的时候，它被理解为政府对公告“不屑一顾”——当然，这并非政府的原意。华盛顿、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理解的——但在美国的外交界，“默霖”一词造成的损害最大。就在星期六早晨，东京最大的报纸之一《朝日新闻》，把波茨坦公告说成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玩艺儿”。日本人民一方面知道了公告的存在，但同时又得到保证，他们的政府认为这个公告是无法接受的——这根本不是头天下午内阁会议的决定。然而，日本人民不会知道这一点，正象他们对政府各省、官邸和皇宫里偷偷进行的其他事情毫不知晓一样。于是，他们对波茨坦公告不屑一顾，因为政府对他们说，这个公告只配如此²。

翌日，七月二十八日，星期六，铃木首相同意在四点钟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将讨论同盟国的公告。针对这个头等重要的、意料之中的问题，铃木答复道，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开罗声明的“旧调重弹”；政府认为，这个公告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玩艺儿”。然后，他又突然加了一句，“我们对它根本不屑一顾。”接着，他宣布政府决心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直至胜利。

东乡得知铃木在记者招待会上的答复以后，气得暴跳如雷。他坚决表示，铃木的讲话显然不符合内阁成员共同作出的决定。同时，他也意识到，他对此无能为力：首相话已出口，覆水难收。

然而，损失已经造成。七月三十日，星期一，日本国内发表了铃木的讲话。世界各地的报纸也收听到了这个消息，它们报道说，日本甚至不屑“拒绝”这个公告。美国国防部长史汀生后来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美国

……只能进一步表明，最后通牒（指波茨坦公告——译注）中的话是完全算数的。它说，假如日本继续战争，“全面使用我们的军事力量，再加上我们的决心，将意味着日本军事力量不可避免的彻底覆灭，正象日本的本土必将被彻底摧毁一样。”

为达此目的，原子弹是一种最合适的武器。

与此同时，日本继续等待苏联方面的答复。

日本驻苏公使打电报给东乡，报告说，说服俄国援助日本的“希望已成泡影”。东乡复电道：“不管你个人的看法如何，你都要执行命令……千方百计争取苏联调停以结束战争，只要不是无条件投降就行。”

东乡曾经担任过日本驻苏公使，所以对苏联人的心理和处事方式并不生疏。他之所以坚持追随这种飘忽不定的鬼火来越过结束战争的泥潭，其原因可以用他自己的话归结为：“无论我多么卖力地动员日本军部跟美国人或英国人直接谈判，他们都不会听从的，对此，我确信不疑。因此，我们必须尽力通过苏联进行谈判，因为现在看来没有其他途径可以结束战争。”

军部不相信可能跟苏联也达成谅解。早在六月中旬，阿南就已经预见到，俄国人“将会进攻日本，正象美国人准备在我们的岛屿登陆一样。”直到最后一刻，他都坚持这种观点。投降前几天，他对内务相阿边玄龟说，只要日本再稍稍坚持几天，跟美国军队在南部九州交上手，美国就会非常担心苏联占领亚洲大陆和日本北部，它将会急于缔结一项和约。这么一来，美国就会主动提出较为有利的条件。海军的看法是，冲绳战役结束后，俄国人将要参战。这也是海军希望日本军队在冲绳顽强抵抗，重创敌军的一个原因。

尽管苏联方面已经宣布了苏日中立条约不再予以延期的打算，尽管莫斯科给东京的答复大多是模棱两可的沉默，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天皇本人仍然寄希望于苏联的“斡旋”。在日本等待斯大林答复的过程中，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

当时，日本全国上下似乎不知所措。日本人民被教导说，日本从未打过败仗，投降是一种耻辱，不胜利，毋宁死。人们很难相信，也无法相信，看来就要发生的事实际上已经出现：所有现存的、一成不变的价值准则完全被推翻了。

使日本人民更为震惊的，也许是天皇的地位问题。日本人相信，天皇不仅是天之骄子，而且他本身就是神；日本的继续存在取决于天皇的继续存在，开天辟地历来如此。现在无法猜想，假如当时同盟国保证以天皇为代表的日本政体得以保存，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战争可能会结束，军部不得不让步——俄国人就不会乘机进入中国东北。但这些都是空谈而已。在昏头昏脑中，日本走上了唯一的一条似乎朝它敞开的道路。八月的头几天平平静静地过去了，但这几天并不是毫无希望的观望。

八月六日，答复来了。

是日八时，广岛的雷达发现了两架 B—29 轰炸机。空袭警报响了起来，这两架飞机钻入高空。电台广播说，这是一次侦察飞行。在广岛这个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四分之一居民中大多数没有打算躲避空袭，他们估计不会有轰炸。很多人昂首凝望天空，注视着飞机的飞行。

在前面一架飞机上，投弹舱的舱门打开了。八时十五分十七秒，地面上的很多人看到一簇降落伞从其中一架飞机上落了下来。

霎时间，闪起一道眩目的白光——六万四千人立刻毙命或者奄奄一息。

这就是对日本观望的回答。不出所料，这种回答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美国。美国曾威胁说要“迅速、彻底地摧毁”日本，现在它迈出了第一步。

大约中午时分，东京收到了同盟通讯社发出的一条电讯。但是，直到傍晚才得到有关这一劫难的详情。这是第二方面军通过吴市海军造船厂发来的一份报告，甚至直到这时，有关细节也只是一鳞半爪。那天下午，东京获知的消息仅仅是，几架敌机投下一颗类型不明的炸弹，破坏惨重。第二天拂晓，陆军参谋本部副总参谋长川边中将收到了一份简短的电报。电报说，仅仅一枚炸弹转眼之间就把整个广岛化为乌有。事后，川边将军说，他怀疑这枚炸弹就是原子弹。

不管怎样，他的同僚们很快就消除了疑虑。在东京，政府听到的来自华盛顿的广播证实了川边的推测。杜鲁门总统在广播中说：“在历史上最大的科学赌注中，我们耗费了二十亿美元——结果我们赢了。”他又说，如果日本人“现在仍拒不接受我方条件，等待他们的将是一连串的毁灭从天而降，这种打击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

关于广岛发生的事情，东京现在已经一清二楚。按照杜鲁门的说法，“太阳获取能量的这一源泉”，现在能够使这个日升之国完全陷入黑暗之中。在它的宝座上坐着太阳女神的一位嫡传子孙。但是，东京对于这种揶揄已毫不在乎。形势要求激烈的行动——然而，笼罩着日本首都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冷漠，使得那些身负决策重任的人仍然按兵不动。

第二天，八月七日，军部发表了一项公报。公报说，“少数几架B—29轰炸机”对广岛的空袭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敌机使用了“一种新式炸弹”。军部说，“有关详情目前正在调查之中……”当天晚些时候，东乡向内阁通报了杜鲁门的声明，但没有采取任何明确的行动。

八月八日，东乡向天皇建议，日本必须尽快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于是，天皇命令外相向首相指出，鉴于敌人已经使用了“新式”武器，日本现在已无力继续进行战争，必须想方设法尽快结束战争。日本应该接受这一无法避免的结局。根据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的说法，天皇陛下说，他认为重要的是马上终止战争，他个人的安危倒是其次。他坚决申明，广岛悲剧决不能重演。

于是，铃木召集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紧急会议。但是，由于其中一个成员被别处“更紧急的事务”缠住不得脱身，这次会议只好延期。

与此同时，军部试图封锁来自马尼拉和冲绳的敌方广播，消除敌人在东京上空空投的传单的影响。这些传单说，同盟国愿意在不摧毁日本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争。军部宣称，无论如何，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甚至对美国人来说，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武器既变化莫测，又危险万分。同时，日本政府通过瑞士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抗议。

同一天下午，在莫斯科，日本驻苏联公使被召到莫洛托夫的书房。莫洛托夫打断了佐藤的问候，直截了当地开始宣读一份简短的照会，照会最后说：“……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八月九日起，苏联与日本将处于战争状态。”不出两个小时，苏联红军就进入了中国东北，开始有条不紊地歼灭曾经一度战无不胜的日本关东军。

日本人认为，苏联的举动既不可饶恕，又是非法的，因为苏日中立条约要到一九四六年四月才满期。但在杜鲁门的帮助下，斯大林却把他的行动变成了合法的行动。至此，铃木政府明白了，毫无疑问，如果不无条件投降，唯一结局只能是彻底覆灭。

然而，看起来，被全部歼灭的可能性倒正是军部求之不得的。在八月九日星期四那个酷热的早晨，对东乡外相来说，和平

就象是沙漠中的垂死者在远方看见的一股清凉的泉水。八时，东乡来到位于东京北部中心地区小石川的铃木首相官邸，气冲冲地要求立即召开前一天延期未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宝贵的时间已经丢掉了：现在，战争必须尽快结束——或者较快地结束。

铃木答应了。他对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说：“让我们这届内阁担负起使国家顺利结束战争的责任。”他的政府在利用苏联“斡旋”的问题上遭到了不光彩的失败，在正常情况下，他与他的内阁要引咎辞职。然而，在那个星期四早晨，日本的形势远远不是什么正常情况，铃木显然抱定决心尽力为日本火中取栗。

东乡接着去见海相米内光政大将。米内始终认为，日本除求和之外别无他途。在东乡离开海军省之前，高松亲王——一位海军舰长——向他打听形势如何，东乡的答复令人失望。他说，他认为，通过谈判取得比波茨坦公告实质上较为优越的条件，现在已为时过晚；在竭尽全力的同时，他感到日本只能坚持要求保存国家政体，别无其他。

与此同时，天皇——这种政体的象征，代表其意义和存在的人——已经跟内大臣木户侯爵交换了意见。他要木户再次向铃木首相传达天皇要求以最快速度终止战争的愿望。此时，铃木刚刚来到皇宫，他答应立即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紧急会议，与前首相们进行磋商。这些前首相们人称“重臣”或“元老”，他们的责任是经常向天皇提出建议。

星期四上午十一时，世界上的第二颗原子弹在日本最西部城市之一、九州岛的长崎市上空爆炸了。就在半小时之前，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在东京皇宫里重新碰头，继续不慌不忙地商讨对策。那里距飞机飞过的地方大约六百英里。

铃木首相率先发言。他说，鉴于广岛事件和苏联侵占中国东北，日本实际上已经不可能继续战争。铃木最后说：“我认为，我们除去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外，别无其他选择。现在，我想听听诸